



农本论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思考



N o n g b e n l u

张秋锦 张 强 龚介民 吴志冲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农 本 论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思考

张秋锦 张 强 著
龚介民 吴志冲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本论：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思考/张秋锦等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3

ISBN 978-7-109-12504-9

I. 农… II. 张… III. 农民-问题-研究-中国-现代
IV. D42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4154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责任编辑 姚 红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mm×960mm 1/16 印张：21.25

字数：382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4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古人云，“民以食为先”，“食为政先”，“农为邦本”，“王者以民为本”。孙中山先生生前也曾提出“重农为本”的重要观点。这些闪光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本书定名为《农本论》，意在继承和发展先贤的重农为本思想，推动我国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逐步树立以农民为本的思想共识，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以农民为本的制度架构，以期使连绵几千年的中国农民问题顽症在当代的以“三农”工作为重中之重方略的实践中实现突破。

以农民为本命题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使然。我们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经过了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农业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基础上的国民经济产值构成中比重也越来越小。同时，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且，农民所处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仍然还没有扭转日益扩大的趋势，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仍然相当尖锐，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要求尽快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呼声日益强烈。更为显然的是，中国虽然不富，但是，国家统筹解决农民问题的能力还是在逐步提升。我国的经济水平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6 年人均 GDP 超过 2 000 美元；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到达 3 000 美元甚至更多；而国内较为发达地区达到了人均超过五六千美元的发展水平。因此，从国家战略高度，痛下决心，深化农村综合性改革，系统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此其时也。

为此，本书构筑了一个视野，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对当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一简要分析。在纵向结构上，本书针对从封

建社会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同特点，扼要分析了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重大意义。书中专列一章，对中外经济学说史上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作了简要归纳，为探寻今天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路径提供理论启示。在横向结构上，本书对当代中国农民发展面临的八个方面主要问题作了概要分析，并按以农民为本的根本方略，提出了逐步解决各类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设想。

马克思曾经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中国由于总体生产力水平落后，因而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代中国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里，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仍然是农民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和谐社会、实现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其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民身上。政府应帮助中国农民发展，创造和谐，推进中国农民公平，保证和谐，实现中国农民稳定，巩固和谐。由于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因而注定了这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大批有志于关心中国农民问题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努力。

本书的四位作者，都是多年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工作人员。在农村工作和调查研究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积累了一些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心得。现在把我们这些研究心得作了梳理，形成了这本《农本论》，献给中国的农民朋友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农民问题的读者朋友，借以抛砖引玉。正如恩格斯所言，我说出了要说的话，我解放了自己的灵魂。我们期望以本书助益于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破解，并祈教于各位同仁。

张秋锦 张 强

龚介民 吴志冲

2007年7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中外经济学说史上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	1
一、中国古代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	1
二、中国近代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	4
三、中国现当代部分学者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部分思想	7
四、世界近代史上法国的重农主义思想	26
五、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	28
六、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创新思想	31
第二章 中国农民问题发展简史	46
一、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农地经营与税赋负担发展简史	47
二、中国历代农业科技的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及其营农思想与方式 发展简史	59
三、中国历代农业风险(灾荒)的社会救助原则与形式发展简史	65
四、中国历代盛世重视农民问题的农政发展简史	71
第三章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现状透视	90
一、当代中国农民的主要特点	90
二、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96
三、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发展趋势	101
第四章 当代中国农民增收问题思考	106
一、导言	106
二、当代中国农民收入概况	106
三、当代中国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	110
四、当代中国农民增收前景预测	118
五、农民增收的他山之石	121
六、建立健全促进当代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五个长效机制	126
第五章 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思考	136
一、中国农民工大军的兴起	136

二、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艰难处境	137
三、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发展展望	151
四、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出路何在	153
第六章 当代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思考	161
一、土地问题是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关键环节	161
二、当代中国农民承包土地开发经营中的问题	163
三、当代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前瞻	174
四、农民土地问题处置的国际借鉴	177
五、大力破解当代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瓶颈	180
第七章 当代中国农民就业问题思考	193
一、导言	193
二、当代中国农民就业问题形势严峻	194
三、当代中国农民就业发展态势评估	200
四、国外农民就业路径参考	204
五、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农民就业通道体系	209
第八章 当代中国农民教育问题思考	222
一、导言	222
二、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存在严重的“五个不平等”问题	222
三、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发展有希望有失望	233
四、农民教育国际经验选粹	239
五、建立健全六项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制度	243
第九章 当代中国农民文化问题思考	251
一、改善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状况是中国农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251
二、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状况	252
三、当代中国农民文化生活发展之路	257
四、国外农民文化生活发展动态	261
五、扭住五个抓手，逐步振兴当代中国农民文化事业	262
第十章 当代中国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思考	269
一、建立当代中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之基	269
二、当代中国农民基本社会保障状况	270
三、当代中国农民社会保障发展走势	276
四、农民社会保障发展的国际潮流	280
五、下大决心，花大投入，尽快解决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284
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思考	293

一、当代中国农民组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	293
二、当代中国农民组织化状况犹如一盘散沙	294
三、当代中国农民组织化前途阴晴交错	297
四、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302
五、推进当代中国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四个重点	305
第十二章 创制构建重农为本的举国体制	312
一、构建重农为本举国体制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312
二、建立健全重农为本举国体制的工作格局	316
三、积极创制保护、实现和发展当代中国农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	323
后记	329

第一章 中外经济学说史上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

《汉书·食货志》这样定义农民：“辟土殖谷曰农。”《辞海》对农民的概念这样界定：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据我国考古学家论证，中国已有8000多年水稻种植的历史，说明中国的农民至少已有同样长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农民问题历史最悠久、农耕文明最长远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农民问题发展史和经济学说史上，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过众多关于农民问题的独创性的精彩思想。如今虽时过境迁，但仔细学习思考，仍不无启迪。

一、中国古代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

几千年的古代中国社会，基本上一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对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以及重视农民民生问题，曾经有过丰富著述。例如，春秋时期以记述孔子思想著称的《论语》；战国时期记述商鞅思想的《商君书》；战国时期记述孟子思想的《孟子》；战国末期秦国宰相吕不韦集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记述了当时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动；西汉初期的《山海经》，记述了战国时期和西汉初期农业物产、历史地理等发展状况；东汉时期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中，记述了许多关于古代中国农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生产的经验和土壤学方面的知识；公元6世纪前期，北魏贾思勰编撰的系统总结黄河中下游地区农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齐民要术》；公元13世纪后期，元代大司农司编写的记述当时农民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情况的《农桑辑要》；公元17世纪前期，明朝末年科学家徐光启撰写的介绍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反映当时中国农民生产力水平的《农政全书》，以及其他一些涉农文献中，都有丰富的关于古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朴素思想。

中国历代农本思想的内涵可归纳为“六个本”。一是衣食源之本；二是国家经济繁荣之本；三是国富民足之本；四是治国安邦之本；五是富国强兵之本；六是知礼仪道德之本。北魏孝文帝《劝农诏》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

天”的千古重农思想名言，一直沿袭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今天。诚然，我们吸取重农思想的“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安天下安、农村稳天下稳”的精华与内涵，但要摒弃“崇本抑末”、“重农业轻农民”的时代局限。

中国历史上的夏禹躬耕而有天下大治；两汉文景之治、光武帝之治；北魏孝文帝之治；唐太宗之治；宋太宗之治；元世祖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圣祖、高宗之治等盛世时期，其根本经验就在：每次“大乱后的大治”都是在重农思想指导下，采取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政策措施，符合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发展我国现代农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借鉴和无可估量的价值财富。

（一）农民安则国家安的思想

孔子生于公元前 552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是我国春秋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关于农民安则国家安的治国安民思想有多处论述。他在《论语·颜渊篇》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礼记·大学篇》中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在《论语·季氏篇》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其核心意思是，只有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富足了，国家才能富足强大。如果把财富都聚集到国家和官员手中，农民很穷，则会失去民心，社会不得安宁。

《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管子总结历代统治者能够“王天下”的共同经验是“富国多粟生于民”。

战国时期的商鞅，说服秦国的秦孝公实行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成功的大规模国家变法改革，推行了一系列安民强国的新政。记述商鞅言论的《商君书》中说：“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意为全国人民都不轻视农民农业，那么国家一定安全，没有危险。《商君书》中又说：“农者殆则土地荒”。意为农民消极怠工，那么土地一定荒芜，农业不兴。

（二）重视农民和农业的思想

商鞅提出了“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并为秦王朝制定了重视农耕、奖励农耕、抑制商贾、限制工商的许多政策。^[2]例如，农民生产粮食布帛，超过常人产量部分可以免除徭役。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商贾富豪高利贷者兼并农民土地，保证秦国农民专心致志地发展农耕。

比孟子稍晚的战国时期另一重要思想家荀子（约公元前 313 年至公元前

238年)也有许多重农思想。《荀子·君道篇》提出“省工贾,众农夫”。意为节省、减少非农业开支,增加农民和农业开支。《荀子·富国篇》认为“工商众则国贫”,^[3]意为国家只有增加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

西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在严酷的农民战争中看到了农民的伟大力量,十分重视农民的作用。《汉书·酈食其传》记述了刘邦的重农思想:“王者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意为刘邦认为国家要以农民为治国之本,而农民以吃饱肚子改善生活为第一大事。汉文帝下诏,提出“农为天下之本论”。

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在《劝农诏》中提出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国本民天”重农思想。唐太宗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先”的重农从政思想。唐玄宗提出“农为政本,食乃人天”的思想。宋太祖在《劝农诏》中提出“生民在勤,所宝惟谷”的思想。元世祖提出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的“三本”思想。明太祖提出了“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道理之原”的重要思想。清太祖提出了“重农积谷”的重农思想。康熙皇帝提出了“重农贵粟,藏富于民,经久不匮,洵国家之要务也”的重农思想。

(三) 给予农民土地恒产的思想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荀子都认为,国家要给予农民一定数量的宅地和耕地财产,让农民能安心地从事农业生产,则国家也就能巩固安全。《孟子·梁惠王篇》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意为聪明的国君在规划预算老百姓财产时,必须满足老百姓如下的基本要求:上能孝敬、赡养父母,下能扶养妻子儿女,方能实现国家之平安。

《孟子·滕文公篇》中孟子主张,国家实行井田制度,无偿给予每个农民5亩宅地、100亩^①耕地作为农民的恒产,使农民安心地终身在土地上耕作,“死徙无出乡”。^[4]农民有了土地恒产,就能安心务农,养家活口,民殷国安。

(四) 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思想

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另一位思想家老子(又名李耳、老聃,生卒年不详),提出了让农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最初的农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思想。

^① 亩、斤为非法定计量单位,为保持引用原文原貌,本书引用部分均未做换算,15亩=1公顷,1斤=500克。全书同。

汉高祖刘邦（约公元前 256 年或 247 年至公元前 195 年）建立西汉王朝后，牢记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风云，建立了一些向农民让步，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制度。例如，政府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战乱时期在外流亡农民回到故乡，可以领取原有耕地和房屋；将地租降至每年 15 税 1，即农民收获 15 石粮食只向地主缴纳 1 石地租；农民生育子女，免除徭役 2 年。为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政府规定新垦土地减轻租税负担，调动了农民垦荒种地的积极性；至西汉末年，全国农民新垦土地达到 800 万公顷，奠定了西汉经济社会繁荣的资源基础。^[5]

自西汉以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建国之初，慑于刚才结束的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一般对农民问题比较重视，参考西汉初期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思想，对农民实行一定时间的轻徭薄赋让步政策。这当然不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仁慈恩惠，而是为了长期巩固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对医治战乱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具有积极作用。

11 世纪中后期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四法”，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向农民让步，减轻对农民剥削，让农民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典型。王安石变法的基本理论是，要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防止因加重剥削而引发农民起义。其基本政策是，减轻农民税赋，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将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国库，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王安石变法先后颁行了四大新法：一是《均输法》。抑制官商大贾、地方官僚“擅轻重敛散之权”，目标是“国用可足，民财不匮”。二是《青苗法》。规定农民在每年种粮时向官府借贷的“青苗钱”，可在每年夏秋两季粮食收获后与两税一起还贷，利息按 20% 计算，比《青苗法》实施前地主富商高达 100% 的高利贷盘剥，适当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三是《免役法》。老百姓可以不服差役，改为向官府交纳一定数量役钱替代。四是《市易法》。把原来由大商人操控的商业贸易和商务借贷，转由政府设立专门部门“市易务”直接掌控，把这一块原来被大商人获得的经济利益部分收归朝廷，增加“国用”。^[6]

二、中国近代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思想

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辛亥革命、20 世纪 20~30 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有不少闪光的农民问题新思想。

（一）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教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洪秀全在其《救世》、《醒世》、《觉世》三篇教义中，明确提出上帝是平等自由博爱的上帝。人人都有信仰自由。要在上帝的统率下，实现国与国平等，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贫与富平等，反对私、反对妖、反对不正、反对压迫。^[7]

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提出的人人平等思想，只是无法实现的美好的空想。当然，它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民主发展进程还是具有重要的启蒙和引领作用。

（二）有田同耕的平均地权思想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于1853年发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有田同耕的平均地权思想。《天朝田亩制度》中有一段反映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朴素平均主义思想的理想化的文字：“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8]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推翻2000多年中国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8月发起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建党宗旨。1905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解释“三民主义”的时候，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孙先生指出，民生主义的要义，是要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孙先生认为，只有取消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给予农民平均地权，让每个农民都有一份均等的土地耕作，才能发展经济，社会安定。孙先生平均地权的目标是，“私人永远不用纳税。（国家）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具体实行办法是，核定全国土地价格，将现有的土地价格收入归原土地所有者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值的土地收入，应收归国家所有，由全国人民共享。^[9]

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在腐朽没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完全没有施行的基础。但是，孙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对后来的革命者在农民土地问题上思想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重视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

1905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阐述同盟会的宗旨时，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新思想，史称“三民主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以关注人民民生为核心，同步解决民

族、民权问题，逐步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这是一个关于人民民生问题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思想。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要义是平均地权，实业归公。通过平均地权，调动广大农民种地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走狗的清王朝，“傀儡既复，民国即立”。只有打倒腐朽的清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民富国强。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国民政府。孙先生主张，全体中国国民要在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指导下，创建民主宪政政府。国家要制定每个国民都要遵守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保证国民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通过平等参政为国民争取更多的利益。^[9]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为我们在理论上勾画了一个国民平等，社会安定的理想蓝图，对后世探索中国民生（主要是农民）问题解决路径，具有重要启迪作用。但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制度下，它只能是一种画饼充饥的乌托邦。

（四）以教育兴国为重点的乡村建设思想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创始人晏阳初先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学成回国后，抱着终身为穷苦农民大众服务、为改变中国乡村落后面貌服务的理想，来到了河北省定县，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先生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如果不改变农民贫穷、农村落后问题，则中国永远免谈现代化。晏阳初先生认为，中国农民和农村落后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穷：贫穷苦难；愚：没有文化；弱：身体虚弱；私：自私自利。解决这四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开展以教育兴国、科技兴国为重点的乡村建设。通过发展农民教育、生计教育，逐步普及农民文化知识和科技知识，提高农民工作能力，解决农民“愚”和“贫”的问题。通过开展道德教育，解决农民“私”的问题。通过发展卫生教育，建立农民医疗保健制度，解决农民“弱”的问题。

晏阳初先生根据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身体力行，以河北省定县为其乡村建设实验基地，后来逐步扩大至湖南省的许多地区。晏阳初先生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建立农民学校，为广大农民免费扫盲；创办农民生产合作社，兴办农民小工厂，尽心尽力为穷苦农民服务，在小范围里取得一定成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晏阳初先生到了四川，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在重庆北碚创办了“四

川省乡村建设学院”，免费培训农民，培养各类乡村建设人才。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创始人梁漱溟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至抗日战争爆发的近10年时间里，抱着改造中国，要从夯实乡村建设基础，抓好农民教育做起的理念，先后来到广东省部分农村、江苏省昆山县、河北省定县、山西省部分农村、山东省邹平县和菏泽县等地从事乡村建设活动。先后创办了“广东乡治讲习所”、“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许多培训农民学文化学技术的农民培训专业学校和农民培训机构，试图改变农民无文化无知识无技术的落后状况，推动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在山东省邹平县和菏泽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时间最长，从1931年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历时近7年。梁先生在那里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研究部，每期招收40~50名学生，都有一定文化功底，专门从事中国乡村建设理论学习研究。还设立乡村服务训练部，每期招收300名左右学生，学成毕业后回到各地乡村参加为农民服务的各种工作。梁先生根据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在山东省邹平县和菏泽县先后创建了乡村建设实验区，创办农民学校，培训教育农民；在县城创办卫生院，聘请医科大学学生担任主持医生，为农民看病；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和加工业；建立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帮助农民合作社解决发展资金困难。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局部时间、局部地区、为局部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0]

20世纪20~3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实践，是中国近代关于农民问题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同时，两位老先生身体力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当时的贫苦农民做了不少好事。可是，因为当时中国农民最需要的是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腐朽社会制度，给予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所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两位先生以教育为重点的乡村建设思想当时不可能有效实践。但那不是他们的责任，责任应该由蒋介石的腐败政治承担。

三、中国现当代部分学者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部分思想

（一）关于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部分思想

1. 中国农民太穷，中国农民太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老所长陆学艺先生认为，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城乡差距在扩大。这些年,特大城市、大中城市的建设加快了,城市都相当繁荣,而农村包括一部分集镇却没有相应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以后,由于农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农业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迷,农民的收入增幅,逐年下降。1996年农民收入增幅为9%,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2001年为4.2%,2002年为4.6%。这几年之所以还略增,主要是靠打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加来弥补的。事实上中国现在还有62%的农民单靠农业收入,这部分农民的收入,这些年是减少的。连续7年了,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是停滞和减少的。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1978年农民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1:2.37,1985年为1:1.85,1990年为1:2.2,1995年为2.72:1,2001年扩大为2.92:1,2002年又扩大为3.1:1,2003年扩大到3.23:1。如果加上城市居民还有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隐性收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大。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在继续。城乡差距如此之大,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陆学艺认为“中国农民太穷,中国农民太苦”。农民穷苦是相对城市居民比较而言的,相对我们的经济成就而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惠及十几亿人民,特别是应该惠及处于比较贫困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而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虽然农民人均收入年均有所增加,但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增加的速度要慢得多,差距反而是扩大了。从1978—2001年,我国的GDP翻了三番多,年递增9.35%,但占人口75%的农民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惠。^[1]

2. 中国农民收入问题有四个层次。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先生认为,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可以从四个层次分析:

第一个层次,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明显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采取的粮食提价策略,使粮食价格翻了一番,对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价策略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奏效。1997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降到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4年下滑,除1989年和1990年外,还从未出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有所回升,为4.2%,2002年是4.8%。6年间农民收入增长无一年超过5%。

第二个层次,中国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开始减少。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不到一半。绝对额最高的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收入达到过1267元,2001年降到了1165元,2002年也大致是这个水平。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1998—2000年3年共减少132元。2001年由于粮价回升,农民人均增加30多元,2002年和前年基本持平。这就使农业生产

的增长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农业这个产业持续多年不能给其经营者增加收益,就没有人愿意再对农业进行投资,可能造成中长期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第三个层次,从中国城乡收入的比较角度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476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703元,二者的比例是1:3.1。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段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最小曾达到1.8:1,但80年代后半期又逐步扩大,2001年的收入差距是2.9:1,2002年则第一次突破3:1的警戒线,而且在3~5年内,收入差距缩小的可能性不大。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而农民是4.2%,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4%,而农民是4.8%,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还看不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态势。

第四个层次,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为悬殊。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严格来说不可比。只要个人愿意,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首先要扣除下一年必须支出的生产费用,大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现金收入,是实物折款。对未能出售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农产品,从粮食、柴禾到牲畜粪便,统计时都要计入农民的纯收入中;城镇居民7703元的可支配收入,还没有包括各级政府只对城镇居民提供的财政补贴。如果把城镇居民的所有财政补贴都折算进来,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要达到6:1。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12]

陈锡文认为,更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农民收入达到2476元,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平均数就可能掩盖许多矛盾和问题。我国现在的农村扶贫计划,解决温饱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达到625元,按这一标准,我国农村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是2820万人。如果这个标准再提高200元,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将会达到9000万人。而按国家统计局对农户分层调查的抽样情况来看,11%的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按户籍来算,差不多1亿人的年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仅有15%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中国3/4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

陈锡文认为,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和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开始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途径,其中一个最突出、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改革开放20多年,虽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有所松动,但整体来说,这个格局仍然维持,这是造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13]